

西北联大融汇世界的办学思想与实践

姚 远

(西北大学 a. 科学史高等研究院; b. 西北联大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西北联大具有融汇世界教育办学的宽广视野,提出:“当本‘天下一家’与‘世界大同’之理想,努力争取人类的互助合作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为世界和平计,为将来大同计”,“教育家的眼界”“不能不注射于世界教育”;“未敢以自满,且以世界学术进步之速,时以落后为惧”,“俾渐渐走入世界学术之林,肩负挽救国家之重责”;“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不同教育思想,可以充作吾人参考资料及研究方法”;“研究东西学术,融汇现世界之思想”为建国先决条件的思想,等等。而且,黄文弼在推动中西历史考古学融汇、黄国璋在推动中国古地理学与世界新地理学的融汇、黎锦熙在面向世界科学的新趋势,推动“地志历史化”和“历史地志化”方面,作了与世界学术融汇的有益尝试,各个后继院校也有着丰富的国际学术交流实践,是为其重要办学成就之一,至今仍有其重大借鉴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西北联大;国际学术交流;高等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7)01-0045-10

DOI:10.13763/j.cnki.jhebnu.es.2017.01.008

西北联大有立足西北(另文论述)办学的明确表述之外,也有融汇世界教育办学的明确表述和实践,显示出其宽广的办学视野。李蒸常委、李书田常委、赖琰校长、魏寿昆教授、周宗莲教授、李仪祉教授、姜琦教授、郭文鹤教授均有精彩的表述。其中,以国立西北大学主办的大型学术期刊《西北学术》编辑部主任郭文鹤教授在《西北学术》发刊词中的“研究东西学术,融汇现世界之思想”^[1]的表述最具代表性,故以之为题,作以论述。

一、李蒸：“当本‘天下一家’与‘世界大同’之理想，努力争取人类的互助合作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西北联大常委、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蒸在多处提到这种观念,在论及战后师范教育时,他指出:除对固有文化的承继与传承而外,“师范教育……必须具备远大眼光,当本‘天下一家’与‘世界大同’之理想,努力争取人类的互助合作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以期巩固永久和平之基础”;“师范教育……

收稿日期:2016-1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ZS087);云南省“省院省校人文社科类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合作研究”项目(SYSX201308)

作者简介:姚 远(1954—),男,陕西岐山人,编审,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博导,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科学传播史与科学教育史研究。

必须担负起继往开来之责任……对于世界科学思潮要能吸收与消化”^[2]。他曾游历美国各城乡,深有感触地指出:“先进国家的健全社会,无不首重教育,以巩固全盘建设之基础”;“美国为今日世界最富强之国家,其人民生活以经营商业为主要目标,但其全国重视教育之程度实非任何国家所能及,大企业家恒以其收入之大半办理教育文化事业,故美国公私立学校之发达世无其匹”;“美国今日之富强,教育的力量实为基本”^[2]。

李蒸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攻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美国单师制学校组织之研究》,对美国教育有深刻的研究和体验。

1933年,他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期间创建的“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其实就是按照美国大学须具备“学者”“学生”“保存、发展和散布知识”三要素模式推动的一个大学功能的重要拓展。他在研究所开学典礼上的讲演中指出:“欧洲的大学中,专门研究法律、医学、哲学和神学其他各种专门学科都不附在大学里面,而另设专科学校,或单科大学”;“美国则不然,大学与学院没有一定的界限。”那么,美国的大学到底特点何在呢?他进一步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氏的说法,将美国大学归结为三要素,即“第一,有一个学者的集团,此项学者的集团必须有授予他人以学位,及学术上荣誉之权威;第二,进大学的学生必已受过充分的普通文学和科学的训练,有被指引研讨特殊的专门学术的能力;第三,应用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及出版物等得以保存知识、发展知识和散布知识。真正的大学,须具有这三种要素,否则不配称为大学”。然而,“在目前中国普通的大学教授,只是上课讲书,领导研究者甚少;进大学的学生在高中时代所受的训练多不充实,进大学以后必不能作特殊的专门研究,所以中国所谓的大学,实在不能算是真正的大学”。由此,他提出:“研究所的任务,一方面研究教育学术,一方面造就教育专门人才,所以研究所才是真正的大学,研究生才是真正的大学生,师大所以必须成立研究所,原因即在于此。”同时,他规定了研究所的任务:“第一是教育目标,必须明了世界思想、国家政策和人生理想”;“第二是儿童研究,现在还有成人研究,就是儿童和成人心理及生理发育的情形、天赋智能差异、社会经验差异之研究”;“第三是教育方法,就是如何带引赤裸裸的儿童进入理想的境界问题,其中包括有学习心理、教育用具、教学技术的研究”^[3]。西北联大继承了师大的传统,于1938年在陕南复设以李建

勋教授为所长的师范研究所,相继发表了《美国教育行政之面面观》《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之批评》等许多关注世界教育的论著。

二、李书田等:“未敢以自满,且以世界学术进步之速,时以落后为惧”,“俾渐渐走入世界学术之林,肩负挽救国家之重责”

李书田主持的北洋大学工程教育,一开始就确定了“程度与欧美各著名大学不相上下”的办学目标,使“其毕业生从彼时就能直接入美国东部各著名大学之研究院”,在工程各科教育发展顺序上,亦以世界先进国家为模,以“各国工程学术发展之先后,莫不先土木,次矿冶,再次电机,最后化工”,“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发展之顺序”,亦应循此“天演之公例”^[4]。他提出:我国“近百年来,与欧美民族相接触,日削月割,奄奄待毙。回溯历史上国民一往无前之气概,以与今日一蹶不振之心理相较,令人感慨系之,故居今日而言救国,应以恢复民族之自信心为发轫”;要通过教育,使国民知晓“各强国之所凭借者,我亦可以凭借之”,“凡欧美各国所能之者,我亦渐渐能之”,“我国人之聪明才力,原不在其他各国之下也,因自信心而增加爱国之力量”,“以挽救此垂危之国势”。由此,他提出在建立民族自信心的基础上,还要学习世界先进学术:中外工程技术人士,“得作技术上之研究,一方工程界与实业界可作事业上之联络。《礼记·学记》云‘相观而善之谓摩’”,故“启发知识及观摩”尤为重要。“本院并未敢以自满,且以世界学术进步之速,时以落后为惧,因是举凡学科之改进,设备之充实,无不唯日孳孳,企臻上理”,“以便督促本院,俾渐渐走入世界学术之林,肩负挽救国家之重责”^[5]。

周宗莲教授在《英国之土木工程教育》一文中,详细考察了英国的工程教育与国内工程教育的差距,他指出:“英国教育制度,与我国不同,且英主自由,各校亦不一律”;“英国的工程教育是由学校、厂家与学会三方面负责,而受教育期间,是三年书本,二年学徒,而在资格上,须有学会之某几种考试为之证明”;“英国工程高等教育分大学与高工(College of Technology)两种,且每在一城有一大学,必有一高工,高工在学术行政上属于大学,而经济来源则异”;“普通英国学生之用功,远不及我国(至少与我北洋)”,但是他们却可以出“Newton, Rankine”这些“国际享盛名之专家”,关键是他们有很好的工业基础,“国家工业发达”,教本所取司空见惯,我国学生

则很少见到诸如“水电表、桥架”、“工厂事物”等,因此,“我国今后发展工程教育中的一大急务”,是“必须学俄国,来一个苦干的‘五年实业计划’,使全国工业化”^[6]。赖琰在论及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程技术教育时,指出我国战后需要“二百四十六万”实业技术人才,而目前仅两万人,相距甚远。他认为“在过去,我们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国家沦为帝国主义者的次殖民地,日本人就有‘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口号,希望中国永远做他们的市场及原料供给地,继续供其榨取与剥削。除了派遣大批青年出洋深造外,国内的工科大学,也要把课程标准提高,技术训练加严,才可以造就健全的技术人才”。同时,他也提出向苏联和英美培养技术工人的做法学习,指出:“英美技工人数,占全体工人的四分之一。各工业国都在各工厂办训练班,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各厂共设一千八百个训练班,此次大战前已达三千所,受训技工一百二十万。”^[7]

魏寿昆教授在《谈德国之大学教育》一文中指出,德国与英国相似,大学也分两种:“一曰 Universitat,直译大学,二曰 Hochschule,直译高等学校”,Hochschule 有工专(Technische Hochschule)。他尤其推崇“德国极其开放的大学教育”,“造就个性发展之人才”,“学生能任自己的意愿跟着教授跑,择自己最有兴趣的东西去研读,故最能发展个人之天性而造成天才教育”^[8]。他在论及战后重工业建设时,同李书田所说相同,也强调我们一定要在学习、引进、模仿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建立我们的民族自信,逐渐摆脱“先向外国洋行请教”——“替你设计绘蓝图”——“到外国工厂订货”——“外国人监造一切机器”——“造好后运到中国”——“外国人安装好机器”——“替你训练工人”——“再当顾问指导生产”——一切由外人包办的局面。他指出:“八年来的抗战给我们以莫大的教训,给我们以莫大的自力更生的信念”,“我们的技术并不亚于欧美人,固然我们的技术标准尚不足以与外人抗衡”,但必须在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中,“建立自信力,就是我们有建设重工业的技能,这是工程界由抗战而得的唯一的大收获”。他在论及沦陷期间日本人在东北和华北经营成功的秘诀时,指出日本人的“成功不外四个英文字:一、Cooperation(合作),二、Coordination(联系),三、Order(秩序),四、Discipline(纪律),这四个方面都是属于管理和人事的,我们建设的失败,并非是技术上不如人,乃是因管理之不当,联系配合之不密切……工作之少效率,换言之,工业亦染上中国政治腐败之劣

点,或其本身亦踏上腐败之路”;“我们急需培植大量的工程人才,更需要工程教育家莫大的努力”,其中尤其需要懂得“彼此密切合作”、会“统筹计划”、会管理的工程技术人才^[9]。这正是国立西北工学院设立工业经济系的重要意义所在。

三、李仪祉:“为世界和平计,为将来大同计”,“教育家的眼界”“不能不注射于世界教育”

陕源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西北联大工学院兼职教授李仪祉,早年留德专攻水利,与德国水利界联系密切,且向以世界眼光办学和兴修水利,每当有一大型水利工程,必先办学培养人才,创立西北大学最早的工科、创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最早的水利系,即因应于当时的泾惠渠、渭惠渠建设。他早在民元时期,即创立三秦公学附设留德预备科,并阐述了放眼世界教育的思想。他在西北大学、三秦公学派出首批留日学生时的讲话中提出了教育家眼界的“四阶级说”,即:“教育之方法,以教育之目的而定,而教育之目的乃以教育之眼界为准。自野蛮时代以至文明时代,其教育发达之历史直可谓之教育界之眼界扩张的历史。可分为四阶级:一身家,二社会,三国家,四世界。”其一,“盖人之生也,先知有己,一切行为皆由一己推出,教育亦然。眼界亦可谓极狭,然其所求,纯为一身之利益。推之一家不过一身范围之稍广。如父为子谋利益,是此身家为第一阶级”。其二,“然使长此为己而不扩充于社会上,必多所抵触,而两受其弊,故教育家为第一,不得不将眼界扩充以兴社会利益,使一群之中彼此相将、相养,结成无数小团体,此为第二阶段。其三,“久之,团体与团体相争,小团败而大团胜,涣散者败而团结者胜,故为御外侮计,不能不合无数团体,而成为国。于是,教育家之眼界亦扩充而及于一国,此为第三阶级”。其四,“教育进化之迹数千余年,以至今亦不过至此地步,故现在各国各有特别教育方法,无非自谋富强其国,以抵制外国为目的。然世运所趋,人力弗能遏。有数种教育不期然而足为世界教育之前导。吾国以新造之邦,共和初建,国基未固,虽不能骤舍国家教育而言世界教育,然为世界和平计,为将来大同计,其眼界不能不注射于世界教育者”。此即为教育家眼界的“第四阶级”。第四阶级又有三大要素:一是“各国道德风俗必归于统一,先研究世界之真道德以求改良各国之弊俗,如我国购鬻奴婢、重男轻女、纳妾等俗不合乎人道主义,均宜速改”;二是“各国政治必归于

统一，国政之趋势自以共和为标准，然须人人有共和之资格、知识及道德，始可为共和之国民”；三是“各国势必归于统一，无政府主义于今日世界固不能骤行，而国界亦不能遽化，非各国势均力敌不能长保和平之幸福。若刀匕俎肉，焉得言和平哉。凡此，皆教育家所当注意者。庶中国勃兴有日，世界之和平亦有望矣”^[10](P21-22)。

在创建国立西北大学工科，并任教授兼主任后，李仪祉在国立西北大学一周年纪念会的致辞中，再次涉及面向世界办学的议题。他指出：“环顾世界强国所以发扬踔厉者，皆以有完善之大学故也，而中国所以如此委顿颓靡者，正以无如彼之大学也，故欲炽中国之膏肓，起中国之废疾，自以最高学府为急需。”“欧美大学，包罗宏富，大学之责，不徒以培养数千数万之人才已也，而大学且为一切知识阶级之领袖，社会事业之指导者，国家恒以大学教授为顾问，藉以解决重大之问题”^[11]。这里，他显然赞成欧美大学在培养人才主功能的基础上，生产知识、主导学术研究、服务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做法。

李仪祉自 1934 年起担任西北农专、西安临大工学院水利组、土木系兼任教授，虽处西北，但仍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如与留德时的老师爱理斯(Ehlers)、博尔士满(Profess Boersmann)、李希霍芬的高足阿尔贝脱塔非尔(Albert Tafel)、方休斯等联系密切，先后聘请恩格尔、方休斯为指导黄河水利模型试验，安排冀鲁豫三省派人到德国作治黄水工试验、共同考察水利和擘画治黄、兴修陕西水利，在阿尔贝脱塔非尔(Albert Tafel)去世后还在《陕西水利季刊》载文予以悼念，也有著文《论德国堵塞决口法》、译文《中国水利事业之前途》(方休斯著)等。总之，他将世界先进水利科学引入中国，改造传统的水利科学，并以泾惠渠等陕西“八惠”水利工程为示范，建成了民国时期最大的模范灌溉区，成为我国现当代水利工程教育和科学治水的先驱。诚如方休斯所说：“今日中国对于水工及水利，视诸欧美诸国，不能不谓之落后一百至二百年”，而且，“不能与欧洲诸国共作科学之竞进”，“黄河依然常为大患”，“海航除少数例外，几完全为外人所经营”，“中国古法，已不适用”，“百年悠梦，今待醒矣”^[12]。因此，李仪祉提出，“吾国水利必须有科学之研究”，“以科学从事河工”，“精确测验”^[13]。由此来看李仪祉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陕西水利道路专门学校—西北大学工科、西北农专水利组、西安临大工学院土木系融汇世界先进水利科学思想的水利工程教育，以及西北联大工学

院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陕南五门堰等水利工程的测量和规划，当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

四、姜琦：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不同教育思想“可以充作吾人参考资料及研究方法”

西北联大一西北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姜琦早年留学日、美，并游历过欧洲主要国家，对西方国家的现代教育思想有着很好的了解和把握，并在西洋教育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先后发表《西洋教育史》《从欧美日本的教育研究方法说到中国的教育研究》《欧美师范教育探源》《英国的新学校》《三民主义教育与世界教育思潮之比较》等诸多研究世界教育史的论著。他的《道德原理》提出：中国的道德教育体系建设，“需要西洋科学，补其所短”；其《现代西洋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与《西洋教育史大纲》姊妹篇，论述了自上古至近代西方自然的教育、新个人作业的教育、文化的教育、欧美教育现状与结论，并附有 50 余幅西方教育家的照片。他认为：中国教育的缺陷“不单是在于教育本身，而有大部分应该归因于中国社会组织，具体地说，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经济社会组织的社会，而教育却是模仿欧美及日本的工业经济组织的教育政策，大抵所学非所用，所用非其才”，但因为未实现“三民主义的社会组织”，也就不可能形成“三民主义的教育政策”，由此，他建议中国教育“仿苏俄与德国革命的办法”，“只使教育区促进政治及经济之发展，而不使政治家或经济家去利用教育作为维持他们自身利益之手段与工具”，“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教育理想与教育政策”，规定和出台新学制。同时，他也认为，中国教育也的确有了一些进步，比如“由文、法科教育转变到实科教育”；“由都市教育转变到乡村教育”；“教育与政治、经济互相结合”等^[14]。他在《三民主义教育与世界教育思潮之比较》中指出：“我们在说明三民主义教育以前，则不能不先把世界教育思潮做一度分析的研究，然后再来拿我们底三民主义教育与他们比较，看看彼此有何共通之点及我们底三民主义教育之特殊性究竟何在。”^[15]他认为，近代以来特别是在当代，世界上主要有三种教育思潮：一是法西斯国家的教育之趋势，即德、意、日等教育实施上最近的倾向，它以国家或民族为至上，具有集中化、军事化、民族化、农村化特点；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之趋势，即苏俄教育实施上最近的倾向，它以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具有平等化、生产化、政治化特点；三是民主主义国家的教育之趋势，即英、美、法等教育实施上最近的倾向，它

以自由平等为基本原则,具有平等化、社会化、个性化特点。他引述马克思的观点,阐述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特点,“在苏俄,她的生产教育或多艺教育是根据马克思的主张而设施的,马克思说‘多艺教育的目标,在使儿童和青年了解生产历程上之普通的原则,并使其能运用工业上最简单的工具’,后来浦龙斯克(P. P. Blonsky)就是根据马克思的这种主张设立机械工业的劳动学校,欲把学校作业建设于经济的生产劳动的基础之上”,故“苏俄的生产教育,是以纯粹经济为出发点的教育”^[15]。姜琦指出:“中国底现代教育之改革,还是受西洋教育之影响”,“似乎是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种国家的教育趋势之总和”,“有一种不分离的关系”,但“三民主义教育的本身自有它的特殊性之存在”,“区别于法西斯、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是一种独特的东西”^[16],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不同教育思想“可以充作吾人参考资料及研究方法”^[17]。这就是姜琦对战时中国教育的一个总体理解。总之,今天的世界教育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故须相互借鉴和融合,但又不能脱离自我社会组织形态,去另搞一套,必须保有适合于自己民族或适应自我社会组织形态的教育体系。

五、郭文鹤:“研究东西学术,融汇现世界之思想”为建国先决条件的思想

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北学术》编辑部主任郭文鹤在《西北学术》发刊词提出:“今日世界上之弱小民族,皆我民族之同类也,即帝国主义者之民族,亦我民族之同类也,团结全世界之民族,使皆求解放与独立,并组织民族国际,以进谋世界之大同,非我民族,岂异人任。”为此,“学校当局,痛感文化使命之重”,提出“发扬我民族之精神,融合现世界之思想,且特别研究民族发祥地之西北数省”的办学理念,“以冀对西北建设有所赞益”。

他指出办大学必须研究学术,而研究学术,则必须“融汇现世界之思想”。就此,他谈及世界思想进入中国的历史,指出:“过去及现在,全世界思想可划为三大分野:一为中国,二为印度,三为西洋。三大分野之思想,各有其优点,亦各有其缺点,取一舍一,均不免偏蔽,然印度与西洋,其主观观念极强,对于自己思想,则尊重之,对于他人思想,则鄙夷之。其有我无人,凌厉直前之慨同有所长,亦有所短也。”然而,“我中国不舍己长,亦不护己短,对于自己思想,决不完全放弃,对于他人思想,亦能尽量接受,故过

去印度思想,一入中国,即为中国所吸收,现在西洋思想,一入中国,亦为中国所吸收。”^[1]

他进一步指出,外来新思想进入中国,必有新旧思想冲突时期、迎新厌旧模仿新思想时期和新旧思想融合时期,而这种“融合”尤为重要。西洋思想之入中国也,已 300 余年,已经过冲突时期,进入模仿时期,尚未完全达到融合时期,而大学则负有这种“融合”之责。他认为:“欲竟此融合之全功,其责任悉在吾辈”;孙中山的“民生哲学、民生史观,即融合古今中外思想而铸成者也,国父开其端绪,发扬而光大之,其责任亦悉在吾辈”;“夫思想为精神之结晶,精神乃能力之发展,而学术又思想之表现也。一时代之思想,必表现于一时代之学术,而凝结成为一时代之文化。文化以学术之累积而益大,社会以文化之光辉而日新,故改进社会,必自研究学术始,研究东西学术,融合现世界之思想,其裨益我民族之社会改进,百不待再言而明”。他还进一步强调其意义:“并世各民族,其土地狭小者,皆侵占他人领土,夷为殖民地,用以自肥。此弱小民族,所以与帝国主义斗争之原也。我民族本非弱小,亦受帝国主义者之凌虐,苟非奋起图存,不仅亡国,且将灭种。图存之道,一面抵抗,一面建设……尤建设中不可一日或缓者。……我大学设在西北,原负有建设西北之重任,则研究西北如何建设,实本大学所责无旁贷者也。总之,欲确保我中华民族之生存,必须注重西北发祥地,而发扬民族之精神,融合世界之思想,又为建设中华民国之先决。”^[1]这种思想,立足大学的责任、立足西北、立足民族精神,又不囿于本区域或本民族,而是胸怀世界,放眼大同,将“发扬民族之精神,融合世界之思想和建设新中国”有机地结合起来,确有其高超之处。

六、黄文弼、黄国璋、黎锦熙融汇世界学术的探索

(一)黄文弼推动的中西历史考古学融汇

19 世纪末,欧洲的考古学已经日渐兴盛。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 1926 年从美国学习人类学归来的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1927 年 4 月,西北科学考察团出发,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旭生)被推选为中方团长,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该团去新疆进行考古工作,主要由黄文弼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高昌古城、交河古城遗址和高昌墓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汉唐时代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址,在罗布淖

尔附近调查发掘史前遗址和汉代烽燧遗址；袁复礼在吉木萨尔附近，勘察并实测唐北庭都汉代烽燧遗址，且获汉代简牍 1 万余支。1928 年 10 月，董作宾在安阳小屯、1929 年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1929 年李济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和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1930 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参与的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等等，均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在黄文弼之前，西方探险者在西北的活动，除少量学者外，无疑多为“挖宝”式的活动，谈不上“考古”二字。中国的学者初期考古活动，也还较多地受传统史学的影响较深，是“从对历史文献的研究中寻求考古工作的线索和实证”^[18]，黄文弼科考出发时就带有 6 箱书籍。黄文弼发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既有对“纸上材料”和“地下之材料”的相互印证和“异族之故书与吾国旧籍”的相互印证，又有外国学者与吾国学者研究成果的相互印证和室内研究工作与野外实地踏勘工作的相互印证，以及从考古、历史、文化、地理、宗教、自然科学等方面，开展多角度、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他还出版了“三记两集”考古专著，其中《罗布淖尔考古记》是我国第一部符合现代考古学体例的考古报告，并以其为代表的考古学演变为标志之一，实现了晚清民初以来中国学术传统向现代学术形制的转变，故被誉为我国西北考古第一人，我国国际合作科学研究第一人。向达在《评黄文弼近著高昌三种》中也认为“西渡流沙，穷年兀兀，用科学方法以追随西洋先进之后，与之协作，为各方面之探讨者，以前尚未有也”^[19]。

黄文弼在外国探险家长期把持的我国西北考古领域，“以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为基础，积极研习西方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走出了与李济、梁思永等人不同的另一条中国式考古学发展之路”^[20]，“所得材料之丰富，尤不亚于外人”^[21]。他虽然不懂外语，与斯文·赫定、贝格曼无法进行语言交流和文字交流，甚至由于黄文弼强烈的主权意识和多次阻止外国团员侵犯中国主权，也造成与外国学者的对立，但总体看来，这种野外考察制度、考察方法、互相观察模仿，甚至互相竞争式的交流，还是在中西考古学的交流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 黄国璋推动的中国古地理学与世界新地理学的融汇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全国各国立大学中单独设

地理系者，只有北平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三所大学，而其中尤以 1927 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独立为地理系以及黄国璋教授为主任的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最具代表性。并且，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在全国各大学之地理系中历史最称悠久”^[22]，向以“培养中等学校地理教师”，“辅助中等学校地理教师改进教学技术、充实教学内容”^[23]，因此，其承担的融汇世界，改造中国古地理学的任务比其他学校更为重要。另外，史地课程史学与地学合一，长期为各类教育的基础课程，由此作为中国传统学科融汇世界的案例也更具代表性。

黄国璋教授是我国留美攻读经济地理学第一人，先后主持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 7 所大学的地理系，创办中国地理研究所，曾任中国地学会总干事、发起创建九三学社，任总干事。他在改造记述性我国传统的地志学，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地理科学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从北平师大到西北联大主编的《地理教学》是实现他这一抱负的一个重要平台。他在《地理教学》创刊号的《发刊词二》中指出：“地理之学，自古已盛，希腊以之穷理，罗马以之佐治，降及中世，专事记述，反形衰替。迄十九世纪科学鼎兴，德儒洪波德李特诸氏，别裁卓识，首倡地理革命之帜，冀起中世积久之衰，其于地理现象，不仅叙述，且加解释，比较异同，推求因果，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于是地理学顿呈返老还童之观，而得跻诸近代科学之林”；“地理新潮滚滚东来，在国内新兴科学中，俨如异军之突起。”^[22]这里，科学的经济地理学的先驱德国洪波德(Alexander Humboldt, 1769—1859 年)和李特尔(又译立得儿，李特，Carl Ritter, 1779—1859 年)的新地理学，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分开，分属于自然科学和哲学两个部门，认为自然有作用于人类，对黄国璋这位我国最早修习经济地理的学者影响尤大。

然而，“吾国地理之学，兴起亦早，《禹贡》一书，是其嚆矢，《史记》以货殖立传，《汉书》辟有地志，州郡方志则始于六朝，然体例相沿，浩博是务，名为地记，实则类书，领域未明，建树自鲜”。在此背景下，“虽以外感地理新潮之震撼，内覩国步之维艰”，“中小学地理教育，依然故我，迄少进步，地理教员既多缺乏专门训练，又复苦无进修机会，教法教材，一仍不变，因陋就简，改进莫由；一般学生对于地理一科大都缺乏兴趣，本其传统观念，视为无足轻重，地理知识之浅薄，可于历届各大学入学试卷中窥测之；至于一般国民，对于地理新潮，更若无所感应，视此情

形,欲期地理学长足之进展,斯诚忧忧乎其难矣”。因此,“促进中外地理教学,以广立吾国地理进展之始基,此固全国有志地理研究之士所不容或缓之图也”^[22]。

如何融汇世界地理新潮,改造中国古地学呢?黄国璋的切入点,选择了以《地理教学》为平台,首先由中小学地理教材的革新和改造做起,而这正是“以培养造就师资为能事”的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之所长,“亟图改进,当亦责无旁贷”。于是,他着手“积极充实图书仪器设备,改良研究环境,并于改进中小学地理教学,尤多注意,凡有利于中小学地理教学之事项而为本系人力财力之所及者,莫不规划周详,亟图实现”。为此,采取了很多有效的积极措施:一是“凡地理上之新学说、新发现,或以翻译,或以转载,或以摘要,或以专著为之介绍”;二是出版中小学地理挂图,制造中小学地理模型,供给“地理基本知识”、“小区域之专门研究”、“国内外之教学资料”、“各项新统计、图表”等地理教材;三是从地理教学原理、问题、实施方法等角度,“讨论教学方法”;四是设立地理教学咨询处,解答教学疑问;五是自1937年元旦始,按月刊行《地理教学》杂志,随时露布地理图书介绍、时事问题研究、国内外地理消息。哪怕抗战爆发学校迁西安组成西安临大一西北联大地理系后,他以刊物为阵地改造古地学的努力仍未中辍,赓续出版了一期,而到1947年北师大复原北平后,黄国璋重主地理系,遂继续出刊。他在1947年复刊号中阐述《地理教学》的宗旨时,指出:“科学日新月异,地球上各地间之航程,已能借飞机……朝发而夕至,天涯若比邻”,“等于地球缩小”,“此航空时代之发皇,对于地理学实已发生重大之影响”;“复员后之本刊,除赓续创始之原旨”,“尤着重于此航空时代之新地理观点,研讨列邦之立国地理基础,从而求其兴盛衰败之因,以作我国之鉴,知彼量己,审查国情,以讨究适应之策”^[24]。

《地理教学》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对改造中国古地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自然地理方面,殷祖英的综述那林(E. Norin)的《东天山山脉的分析》,介绍了斯文·赫定等人的考察结果,已将天山东段划为5个大的脉络和山带,并开始熟练地运用经纬度、海拔、古生代岩层、结晶片岩、蛇纹石片岩、大理石脉、强烈变质的海相石灰岩、陆相沉积岩、花岗岩侵入、前寒武纪、石炭纪等介于地理学和地质学边缘的名词术语^[25]。这些研究,也为西北联大等高校地理地质系在战后40年代的分立创造了舆论氛围。另外,

在人文地理方面,《地理教学》有较多的涉及,包括物产、人口等多方面,

1942年4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史地系王钧衡等在春假期间带领四年级学生赴巴山北麓作小区域地理考察,也使用测图仪、测高仪、倾斜仪、胶质量角器,实地测量了坡度、比较高度、等高线等测绘仪器,开始使用汉江台区(Terace of Han—kiang)、黄岗岩侵入区(Granite intrusion)、石灰岩形成之喀斯特地形区(Karst Topography)这种中文加英文括注的表述形式。不同的是,其研究方法,开始使用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结合的考察方法,除研究巴山北麓的自然地理以外,也涉及汉江地台之人地相关性等问题。

(三)以黎锦熙《方志今议》为代表的“地志历史文化”和“历史地志化”创新

另外,在1938年,西北联大与陕西省合作,成立“修志委员会”,修纂《城固县志》,黎锦熙代表西北联大参加,另聘地理学教授黄国璋分任自然篇和经济篇的工商、交通二志;历史学教师何士骥、中国文学教授罗根泽、中文系教师吴世昌等分任文化篇;地理系教授兼主任殷祖英分任气候篇;地质学教授张伯声分任地质、地形、水文三志;植物学教授刘慎谔分任生物志;联大常委、水利专家胡庶华教授分任农矿志;地理学教授谌亚达分任人口志;龙文分任合作、卫生、祠祀三志;张永宣分任大事年表、疆域沿革表;陈瑾分任财政志;薛祥绥分任人物志、艺文志及文征等。成员全部为西北联大教授或学生,涉及中国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水利工程等各个学科。黎锦熙特地为此提出修志新体,即“明三术,立两标,广四用,破四障”。其中:“三术”即续、补、创,其中的“创”,又分为“两标”,即“地志之历史化”和“历史之地志化”;“四用”,即用于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和旅行指导;“破四障”,即破类不关文、文不拘体、叙事不立断限、出版不必全书^[26]。这其中的“创”,就是一种融合了中西方新历史观、新地理学观的一种新思想,表明史、地的分化以及综合性的地学向地理学和地质学的分化。比如在黎锦熙等新修的《城固县志》中,关于自然方面即有:地质志(附图);气候志(风候、气温、雨量、物候、在全国气候区中的位置);地形志(汉江盆地概况、本区之地形图、县城地形位置图、山脉略说);水文志(本区重要河流图、汉水流水型、河水含沙量及堆积作用、汉江航运、水道略说);土壤志(土壤分类与成因、各种土壤之分布与分层、各区土壤之特性、土壤与植物之分

布);生物志(植物、动物、论本区对自然生物之利用)等。关于经济方面,则有人口志、农矿志(农业、畜产、蚕桑、蜂蜜、渔业、猎业、林业、矿业)、工商志(工艺、商业、经济、市集)、交通志(道路、航运、交通工具、运输、邮电)、水利志(渠、堰、坝、井、水力利用)、合作志(仓储、救济、新合作事业)。关于政治方面,则有吏治志、财政志、军警志、自治保甲志、党务志、卫生志(人民体格、地方疾疫、卫生行政和医药、禁烟、缠足、发辫之禁革)、司法志。关于文化方面,则有教育志、宗教祠祀志、古迹古物志、氏族志、风俗志、方言风谣志、人物志、艺文志(分为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言文字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艺术、文学、史地等10类)等。其中历史学与地志的分化、地理学与地质学的分化、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的分化,以及有关生物学等现代自然科学内容的入志,不仅是对我国传统史学、地志学、方志学的一种创新,也是对地理学的一种创新,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以及对世界新学科发展的融合。仅从其修志委员会的组成来看,就综合了语言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各个学科的专家,已不仅仅是修一部《城固县志》,或之后西北联大教授们修纂的8部陕西地方志,实际上它代表了以此为载体,民国中后期我国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思想后,我国现当代学科融合、中西新学思潮融合的一次大演习和示范。看来,也只有类似西北联大这样由理工农医综合师范组成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联合体,能够完成这样的大规模融合。

七、西北联大及其后继院校的国际学术交流

西北联大与其后继院校虽处战时西北,然其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仍与世界保持密切的关系,其教师大多有留学背景,故有十分方便的对外语言交流基础。

在“请进来”方面:西北大学聘请了英国籍孔柏德华教授、英国籍传教士贾蕴玉(Charles Carwarine)教授、西北大学与西北师范学院合聘了美国体育教授沙伯格(B. B. Schaberg)、医学院聘请了德国籍德语教师邓马爱娜、日本籍河野日出夫、中村义治、细井敬三、山内丰纪等外籍教师常年任教;中英科学交流馆的李约瑟曾于1945年9月分别访问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和国立西北大学,作了“科学与民主”的演讲,并赠送书籍。

在“走出去”方面,有数十次出国考察或进修:

1945至1947年,傅种孙被派赴英国进修,寄回数百册国外数学书籍;水利专家沙玉清派赴英、法、荷、德等国考察水利;1946年至1948年,医学院毛鸿志被教育部选派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病理科进修,并对美国、加拿大医学高等教育和医疗事业作了考察,撰成详尽的考察报告。

在开设课程方面,汪堃仁教授回忆,他在城固开设的生理学、解剖学等系列课程,不比他在北平协和医院开设的课程差多少,可以说达到了国际前沿;曾炯教授在其数学教学中,运用他在德国哥本哈根取得的成果,使联大的数学教学直击抽象代数等国际前沿数学领域。

在以专著或译著形式研究国外学术方面:许兴凯教授除《道尔顿制与柏赫斯特讲演集》等译著外,还系统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与经济,出版《日本帝国主义与东三省》《日本政治研究》《日本法西斯史论》《日本军需工业研究》《战时日本》等系列专著;杨伯森教授出版《国际联盟之源起组织工作及批判》《国际行政组织概观》《国际行政学》等专著;于鸣冬教授著有《日文文法》,复翻译日本河白嗣郎的《农业经济学》、日本佐藤宽次的《信用合作社》等;徐褐夫翻译出版批评日本侵略东方各国的《东方的战祸》;医学院院长徐佐夏再版译自日本安井修平的《药理学》,王同观教授译自日本同仁会的《妇科学》;等等。

在国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方面:西北大学生物学系余凤早教授在城固时,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细胞学杂志》发表《南京丰年虫两性之发生》,在法国、比利时、荷兰联合主办的《科学会论文专刊》发表《农年虫类肺器官之研究》;西北大学化学系刘拓教授在美国《化学工程》杂志发表了《糖液中加入石棉粉过滤之效果》,以及他在城固利用当地构树纤维造纸、改良当地蔗糖糖浆不易结晶研究等数篇论文;医学院徐佐夏教授在德国《生物化学杂志》发表《肝内蛋白溶解酵素之提取法》《滤纸对于酵素之吸收作用》《细胞内游子平衡之研究》,在德国《药理学杂志》发表《异性同性凝集现象之研究》《温热对于蛙心之影响》等论文;医学院教务长杨其昌教授在德国《耳鼻喉科杂志》发表《神经性鼻炎对于涂布之过敏现象》等。

国立西北农学院王绶教授培育成的大麦品种,在美国获推广,并被美国学者定名为“王氏大麦”,成为美国著名品种之一,获得1945年美国与加拿大大麦分类奖。1946年的《西北农报》专以《王绶教授育种贡献在美国》作了报道。

除此之外,在自办的《西安临大校刊》《西北联大

校刊《西北学术》《西大学报》《地理教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季刊》《西工友声》《西工矿冶》《西工土木》《机工通讯》《纺织通讯》《化工通讯》《北洋电工通讯》《国立西北医学院院刊》《西大医刊》《西北农林》《西北农报》《昆虫学通讯》《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进建》《师声》《中等教育季刊》等 80 余种期刊,发表了毛鸿志的《恶性肿瘤之管理与医教——美、加考察报告之一》等一批介绍国外学术前沿成果的论文。侯宗濂院长在主编《西大医刊》时,强调“国外各大学,未有不作研究工作者,无研究工作之大学不能成其为大学”,还提出了要尽力使《西大医刊》“达到 Lancet(《柳叶刀》世界著名医学杂志)之情形”,“力求赶上世界新潮流”,以使学院“世界知名”的目标^[27]。国立西北农学院周尧教授主编《中国之昆虫》,使用中、英、意、拉丁文等文字专载“纯正的与应用的研究报告”,与《昆虫通讯》等刊交流到了英、美、日、意等国,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西北联大具有较强的师资力量,根据《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北联大教授列传》^{[28](P735-792)}中所列的 128 名教授中,具有留学背景的就有 120 人次,占教授总数的 93.75%。其中留欧(英、法、德、瑞、意)者 42 人,占留学教师总数的 35%;留苏者 5 人,占 4.2%;留日者 31 人,占总数的 25.83%;留美者 42 人,占 35%。另有数十次学生公派留学、教授出国进修、考察。据不完全统计,西北联大与其后继院校还先后聘请 7 名外籍教授,担任外语、体育、医学等教学工作。联大与后继五校还在抗战期间创办或复刊了 84 种期刊,用于发表学术成果或国际学术交流。

这说明,西北联大具有学习和融汇世界教育和学术的便利条件。

参考文献:

- [1] 郭文鹤. 西北学术发刊词[J]. 西北学术, 1943, 1(1): 1-4.
- [2] 李 蒸. 战后中国师范教育方针[J]. 教育杂志(中国教育专号), 1947, 32(1).
- [3] 李 蒸. 在北平师大研究所开学典礼上的讲演(1933-09-28)[J]. 师大月刊, 1933(8).
- [4] 李书田. 中国工程教育之纵横观[J]. 北洋理工季刊, 1935, 3(3): 1-6.
- [5] 李书田. 矿展会的意义及其北洋工学院之关系[J]. 北洋理工季刊, 1934, 2(2): 33-36.
- [6] 周宗莲. 英国之土木工程教育[J]. 北洋理工季刊, 1936, 4(3): 20-25.
- [7] 赖 珽. 工业建设与工程教育[J]. 华侨先锋, 1947, 9(3-4): 3

西北联大虽地处抗战时期偏僻的西北,却并不偏安于一隅,而是具宽大的胸怀和注射于世界的目光,融汇世界先进民族的新科学、新学术,还尝试中国传统地理学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改造和中国传统地志学改造,并创立新的中国考古学、三重证据法、“明三术,立两标,广四用,破四障”等新的史学方法融入中国传统史学体系或地理学科,取得了开辟我国西北新学制和高等教育体系、存续中华民族文脉、创建我国最早的两个考古学科之一和最早的两个边政学科之一等重大教育成果,取得了出版第一部《史学方法概论》、出版第一部清代通史、开辟西北考古、创立我国艺术考古、开辟西北民族史研究、实施南海诸岛接收,测绘十一段国界线、完成第一部《南海诸岛志略》等重大学术成就,从而为中国学术和中国高等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重要工作均可在西北联大前身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北洋工学院找到其源头,也可在西北联大与其后继院校找到其传承和发扬光大的新成就。比如中国传统古地理学的改造,就源于北平师大地理学系 1937 年在北平创办的《地理教学》,抗战中在城固复刊,战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复校后,继续这一伟大的改造。这充分说明,一个优秀的学术传统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and 与世界先进学术不断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积累和传承的过程,也在这种传承中不断发扬光大,聚集了巨大的能量和影响力。正因为如此,从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到东北大学史地系、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史地系,到西北联大地质地理系,一直到战后的西北大学地理系的先后传承和光大,才能够担负起诸如接收南海诸岛、测绘十一段国界线、实施大范围、综合性的西北科学考察这样关乎国家民族重大利益的重要任务。

- [8] 魏寿昆. 谈德国之大学教育[J]. 北洋理工季刊, 1936, 4(3): 12-19.
- [9] 魏寿昆. 中国重工业之将来[J]. 工业月刊, 1947, 4(6): 3-5.
- [10] 李仪祉. 教育家的眼界[A]. 杨德生, 崔智林, 姚 远. 西北大学教育理念文选[C].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4.
- [11] 李仪祉. 在国立西北大学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J]. 天津益世报, 1925-02-01(7).
- [12] 方休斯. 中国水利事业之前途[J]. 华北水利月刊, 1931, 4(12): 1-6.
- [13] 李仪祉. 黄河之根本治法商榷[J]. 华北水利月刊, 1931, 1(2): 1-9.

- [14] 姜琦. 三年来中国教育之解剖[J]. 4(1-2):16-24.
- [15] 姜琦. 三民主义教育与世界教育思潮之比较(1938-10-06于重庆)[J]. 民意周刊, 1938. 55-56.
- [16] 姜琦. 学校社会化之哲学的基础及其史的发展[J]. 教育通讯周刊, 1939, 2(2):3-6.
- [17] 姜琦. 我国大学课程之基本原则[J]. 高等教育季刊, 1941, 1(3).
- [18] 张海.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征与特点[J]. 华夏考古, 2011(4):138-139.
- [19] 向达. 评黄文弼近著高昌三种[J]. 国风半月刊, 1933, 2(4):8-15.
- [20] 王新春. 近代中国西北考古:东西方的交融与碰撞——以黄文弼与贝格曼考古之比较为中心[J]. 敦煌学辑刊, 2011(4):145-154.
- [21] 陈大齐. 致辞[A]. 黄烈. 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C].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9.
- [22] 黄国璋. 发刊词二[J]. 地理教学, 1937, 1(1):2-3.
- [23] 李蒸. 发刊词一[J]. 地理教学, 1937, 1(1):1.
- [24] 黄国璋. 地理教学复刊词[J]. 地理教学, 1947, 2(1):1.
- [25] 殷祖英. 东天山山脉的分析——综述那林氏(E. Norin)的考察报告[J]. 地理教学, 1947(1).
- [26] 黎锦熙. 方志今议——《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案方[J]. 图书季刊(北平), 1939, 1(2):101-105.
- [27] 侯宗濂. 发刊词(1949-08-21)[J]. 西大医刊, 1949, 1(1):1.
- [28] 姚远. 西北联大史料汇编[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3.

The universal conceptions and practices of the Northwestern Union University

YAO Yuan

(a. Institute of Mathematics and History of Sciences;

b.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Institut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nnxi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Northwestern Union University that is known for its universal educational conceptions strives for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of humanity, global peace, academic excellence, learning and knowledge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 nation. Moreover, quite a few scholars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like Huang Wenmi who promotes historical archaeology, Huang Guozhang who promotes geographical studies, and Li Jinxi who promotes the historical chorography and chorographical history.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Northwestern Uni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 higher educational thought

[责任编辑 姜惠莉]